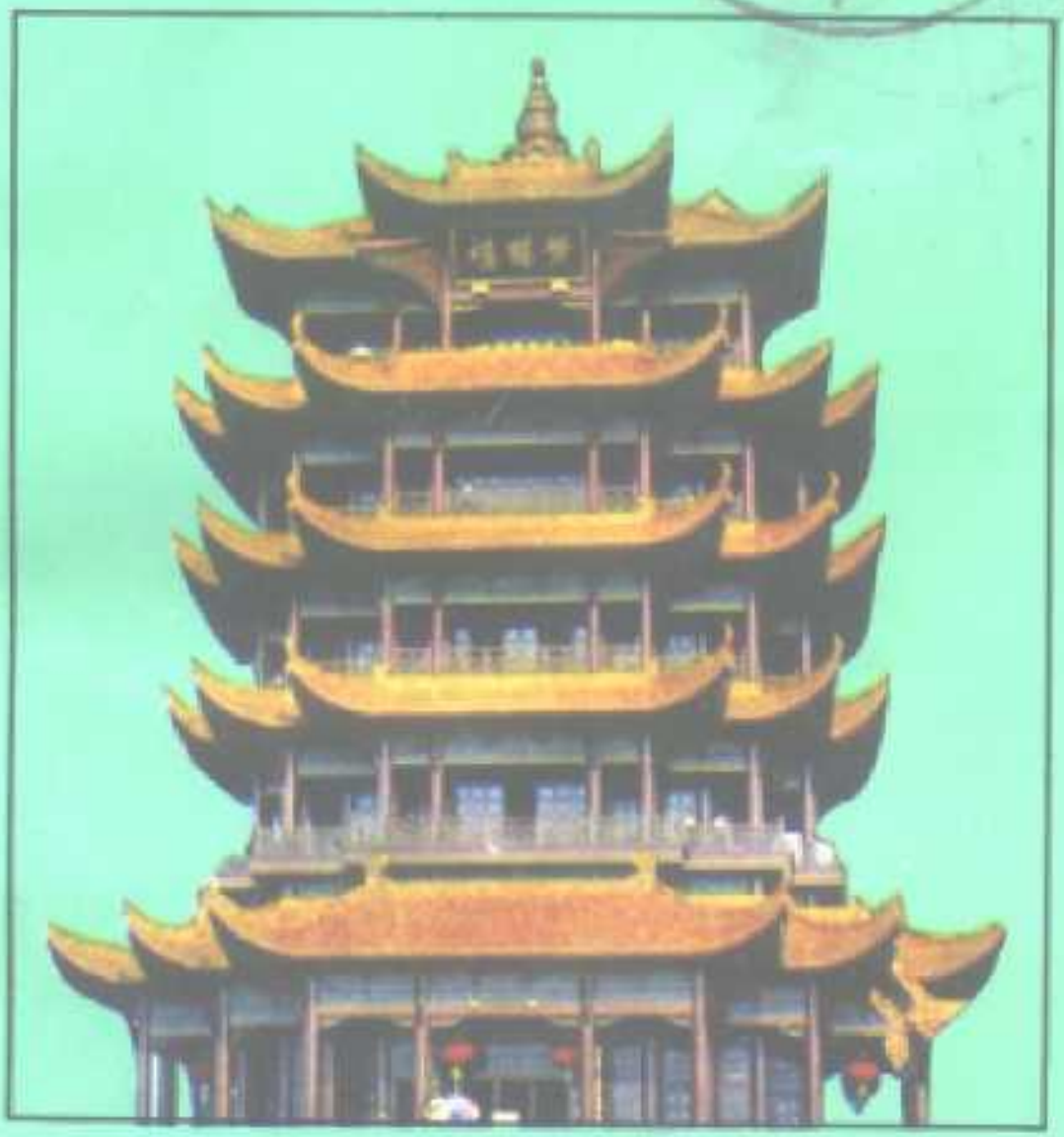
湖北省武汉市优秀期刊

武漢文史資料

一九九五年第四辑
（总第六十二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下）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叶子健
副主任：（按姓氏笔划为序）
皮明麻　华楚珩　李鑫炎
洪　源　彭朝喜　萧志华
顾　问：王干弓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古远清　王惠超　白巍歧
刘　凡　刘宋川　刘志斌
刘通鸾　李　柯　余文祥
汪正本　吴仲炎　吴先铭
吴自强　陈　忠　陈　松
陈隆恺　郑自来　赵玉珠
高光曦　徐明庭　黄　旭
彭端智　董华荣　雷仲康
商若冰　揭鄂英　粟庆安
蔡运琴　潘长胜

****

《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主　　编：萧志华
副 主 编：刘通鸾　胡礼莉
责任编辑：殷小琴
编　　辑：胡桂林

武汉文史资料

一九九五年第四辑
总第六十二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下）

《武汉文史资料》

1995年第四辑（总第六十二辑）

主办单位：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编：萧志华

出版单位：《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本刊地址：汉口沿江大道102号

电　　话：(027) 2832007

邮政编码：430014

印刷单位：湖北中光印刷厂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服务部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刊　　号：ISSN1004－1737
CN42－1056/K

广告经营许可证：武工商字01－30号

出版日期：1995年12月

定　　价：4.80元

EB08/19

WU HAN WEN SHI ZI LIAO 〔1995年第四辑〕

武汉文史资料（季刊）（总第六十二辑）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专辑（下）

目录

历史回眸 LI SHI HUI MOU

（1）参加武汉受降始末…… 徐怒宇
（10）第六战区受降和接管敌伪物资内幕…… 萧润生
（49）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 萧建中

烽火岁月 FENG HUO SUI YUE

（70）挺进武汉西线…… 李家彬
（76）新洲抗战要事简记…… 张剑南 余文祥
（85）在鄂南与日伪斗争的故事…… 江 文

名人轶事 MING REN YI SHI

（94）冯玉祥在庐山二期训练团的一次讲话…… 王长勋
（95）蒋经国冒险探望庐山孤军…… 王宪章
（100）田汉为七十四军作军歌…… 刘一曙
（102）何功伟往返金水闯敌卡…… 徐忠影
（104）名丑姚炳南讽日伪…… 许恺景

英烈千秋 YING LIE QIAN QIU

(106) 抗日英烈艾枫林 …… 徐忠彰
(109) 与日舰同归于尽的空军英烈 …… 盛星辉
(111) 中山舰遇难幸存志士寻访记 …… 王继提

史海钩沉 SHI HAI GOU CHEN

(115) 武汉慰安所揭秘 …… 江 城
(132) 宋美龄为苏军授勋内情 …… 徐世江

往事漫忆 WANG SHI MAN YI

(137) 联合国制宪会议与中国代表团 …… 吴自强
(147) 抗战初期的武汉防空与日机空袭 …… 李修鲁
(151) 重庆日俘集中营参观记 …… 吴鼎臣
(154) 从两首诗说到文协 …… 徐明庭

暴行实录 BAO XING SHI LU

(157) 日寇侵占武汉罪行实录 …… 武文士
(163) 震惊全国的燕子窝惨案 …… 明 监
(166) 目睹日寇暴行数事 …… 汪 浩
(169) 日寇蹂躏邾城纪实 …… 徐华藻
(172) 日寇在青山的暴行 …… 苏发刚 金 锋 甘瑞文
(175) 遭遇日寇大屠杀亲历记 …… 汪少廷
(178) 日寇轰炸汉沙宜秭之见闻 …… 李鸿藻
(184) 日寇在罗汉寺集的两次大杀戮 …… 李叔方

读者·作者·编者 DU ZHE ZUO ZHE BIAN ZHE

(187) 来函照登 …… 徐明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参加武漢受降始末

徐怨宇

抗战前，我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武汉分社主任。武汉沦陷后，湖北省会迁至鄂西山城恩施，武汉分社改名为恩施分社，我仍任主任。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和湖北省党政首脑机关遵照蒋介石旨意，赶紧回武汉抢夺胜利果实，我是参与其中的重要一员。我曾于1980年撰写《“四大金刚”的自述——回忆在武汉“劫收”的前前后后》（刊登在《武汉文史资料》总第一、二辑）。这里仅就我当时参加武汉“受降”前后的经历作简要补充。

成立“前进指挥所”抢占武汉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根据重庆统帅部的命令，各战区应对准备接管的各大城市，在“国军”尚未到达之前，在那里设置“前进指挥所”。因此，第六战区长官部决定临时授参谋处少将处长谢士炎以中将副参谋长名义担任“汉口前进指挥所”主任。

第六战区汉口前进指挥所经蒋介石批准，于8月30日成立。共40名成员。其中有：参谋长徐世骐（原长官部参谋处上校副处长），长官部参谋处研究室上校主任阮成章，参谋赵克东、周伯达，

英文翻译贺德昭（原长官部外事处中校翻译），日文翻译徐相锡、刘亚光，以及副官、电报员等。我和编辑长、电台台长和电报员也在其列。另外还有两名特殊人物：军统湖北站站长田灌夫、湖北省会警察局局长黄佑南。

31日上午，指挥所全体人员按照名次规定，登上两架军用运输机飞向汉口。

出发的前一天，“长官部”空投给日本“支那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一纸命令，命令中有全体到汉人员名单，要求做好一切迎接安排和负责安全措施。

从恩施飞回汉口

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快到汉水口了，我禁不住心情的激动，对驾驶员说：“我们能不能在汉口上空低飞两圈？”他说：“可以。”果然在离地面约500公尺的上空沿市区环绕了两圈。我从机窗俯视下面，一片红瓦丛中夹杂着不少断井颓垣；街道上虽然行人并不很多，但见一个个都对着天空挥手；特别是有些人力车夫，放下车子，站在马路上，不断地跳起身来挥舞草帽，似乎还在高声喊叫。离开汉口整整7年的我，看到这种情景，眼窝里顿时湿润起来。快到王家墩机场时，从机舱向外望去，机场中间高高竖起了一面白旗，跑道上停放着几辆插有小旗的军车。在跑道边的出口处，站着一长列日本枪兵，队伍前面排列着二三十辆插着小旗的轿车，有几个日本军官和三个穿西服的人站在跑道旁边。这时，机舱内的每一个人心情是紧张的，因为行前已经听说过日本陆军是不承认失败的，投降是迫于天皇的旨意，有的自己破腹，有的也可能当场翻脸，来一个同归于尽。所以我也和大家一样，把随身佩带的手枪上膛，准备万一。

舱门拉开，两个黑粗的日本军官站在舷梯跟前，左手扶持战刀，右手行军礼，眼向上望。二人身后还站着一个中国军官，也

是左手扶刀，右手敬礼，戴少将领章，显然是个汉奸军官。还有两个穿西服的，其中的一个正取下草帽对着舱门挥摇，我认识他，他是《武汉日报》（鄂东版）社长杨虔州，也是中统汉口市调查统计室主任。

下机时，谢士炎先行，我走第二，跟着的是日文翻译徐相锡，依次是徐世骐、黄佑南等。两个日本军官一直等到谢士炎在机场站定，回了军礼，他们才放下手来，咕噜了几句。穿西服的日本翻译向谢士炎报告："因为总司令有病，这两位都是代表总司令来欢迎阁下的。这位是日军联络部长福山太乙郎大佐，那位是参谋部冈田大佐。"谢士炎说："好吧……"话未说完，"报告！我是新编二十一军的参谋长赖春贵，因为军长邹平凡有病，正在发烧，命我代表全军前来欢迎长官！"那个戴少将领章的汉奸军官说。这时杨虔州赶上前来和我握手，我把他介绍给谢士炎，谢同他握了手，随即向前走去。日军仪仗队吹起军号，我们边看边走到停有大批轿车对面的帐蓬内，在摆满水果、糖食、香烟、啤酒的长桌边坐下，福山、冈田、赖春贵坐在我们对面，福山通过翻译一再说明"总司令"确实有病，希望原谅，并要求大家放心，他们负责保护安全，而且住食的地方都已安排妥当。

这时，我发现横摆在面前的一长列小轿车上，都插着一面白底红色的太阳旗帜，实在感到刺眼，回身一看，王副官正站在我和谢士炎的身后，我问他："我们不是带来了一些小旗帜吗？"王说："是的。"我接着说："你带两个人过去，把那些轿车上的日本旗换下来！"他说了一声"好"，随即同两个"宪兵"过去。我看着他正将第一辆车上的旗帜扯下来，车里的日本司机把头伸出车外，怒目而视。王副官回头看我，我以眼色示意，他就继续拆换下去。福山似乎已有察觉，待到他回顾时，旗帜已换完。我用腿碰了碰谢士炎，他站起身来，说："我们走吧！"

汉口王家墩机场周围尽是菜园，我们的车队驶出机场时，门

口已经拥满了老老少少的菜农，“好了啊！回来了，回来了……”一个个悲喜交加地喊着。我咽喉哽哽，伸出头来，挥着帽子，只是高声地喊着“回来了，回来了！……”到了大马路上，沿途人流直涌，奔向车队，跟着车辆喊叫。记得在六渡桥，车子几乎无法通行，站岗的警察忙着前后劝阻，也不能制止。人们热爱国家民族的情感令人异常激动。

我们的车队在绕行市内的几条大马路以后，开进了三元里附近的一所大型别墅式的院子里，径直在一个拱形的外走廊上停下。一个日本翻译告诉我，这是日本军部专供日本将级军官进餐、娱乐的场所，名称叫“樱花食堂”。一进门，就发现二三十名穿着和服的青年妇女头也不抬地跪在两旁的地板上，让我们从她们的夹道中走过。这个“食堂”据说只有汪精卫、周佛海、杨揆一、叶蓬少数几个大汉奸来过，其他的中国人一概不接待。因为我们是“大太君”，所以把我们接到这里休息一会，然后再去“指挥所”。

汉口前进指挥所设在怡和村大成路招待所，这是大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以及后来马歇尔、蒋介石、陈诚、陈立夫、张厉生曾经住过的“临时公馆”，一幢两层精巧的别墅建筑，门口有4名日军警卫，院门内还有10多名日军持枪坐守。这是日本军部规定的，因为他们对汉奸部队不放心，怕出问题。紧挨着指挥所的是“中央社”和“研究室”，各占一幢房子。我当即督促架起电台，与重庆通报。当天下午2时发出了到达汉口的第一条新闻报导。

浮在眼前的形形色色

“真空”期间的武汉确实是异乎寻常的战后景象。中山路是当时唯一的干路，一路上尽是炸弹的坑窝和一块块陷塌的路面。稀稀落落的行人，多半衣衫褴褛，甚至蓬首垢面。即使少数穿着比较整齐的，也显而易见是一副病容或者是营养不足，也有极少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西装革履的人，却面带愁容。事后我才明白，这种人是因为与日本当局或汉奸机构有关，因而忧心忡忡，心神不宁。而一部分所谓“地下”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则显然不同，他们多半穿着崭新的中山服，腰佩手枪，一副趾高气扬的傲慢气派，咄咄逼人。正是这几种不同的神态，形成了人群的鲜明对比。

这时，汉口市上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车和马车。乘坐人力车的人不多，一颠一簸的马车上却座无虚席，车后和两边还站有人。有时也有汽车一掠而过，不是日本人的草绿色军用车辆，便是插着国民党“国旗”的小轿车。这也是当时财与势的一个分野。

汉口街头还有两个惹人注目的镜头。一个是，很多铺店关门闭户，门上贴着一张字条“全家生病，暂停营业”，确实是由于全家感染上“登革热”病（一种从南洋传来的病毒传染病）。另一个是，日军的巡逻队照样在街上踏着正步，举着队旗，扬长行进。有时碰上我们这些所谓“接收大员”的汽车迎面而来，他们就耸动队旗，对着汽车行注目军礼。我曾注意观察行人的表情，似乎对这股日本人有一种“你们也有今天”的神色显露。

还有几次我看到，有个别日本军人被一群中国人围在中间，他跪在地上，这个吐他一口唾沫，那个踢他一脚，骂个不停。特别是有次在鄱阳街界限路（合作路）口的英美烟草公司门口，有个日本军官战刀被缴了，跪在地上，脸上已沾满唾沫，不断地弯腰低头，还有人把他的头直往下按。我下车劝阻，群众才让他空手走了。我当时体会到，这决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对一切侵略者的惩罚。

武昌市区更是一片荒凉。这里虽曾设有日伪的“武汉市政处”，但纯粹是个空名，日军早已把武昌划在“军事区”内了。就是长街（现解放路）、司门口、大成路一带这样的主要街道，也尽是日军仓库，路面破损不堪。仅有几家夹在瓦砾中的小店铺，也都半掩着门。眼看着零零星星穷苦的人从门前走过。飞机轰炸后

的残迹满目皆是。谁能想象这里曾经是湖北“省会”的闹市中心啊！

有天晚上，杨虔州陪我乘车看了看汉口的夜景。从怡和村出西商跑马场往沿江马路，经三民路到中山路……，全凭汽车前灯照明，所经之处，寥寥可数的几盏路灯，仅有一点微弱的黄光。时间还不到8点，却已“路断人稀”了。我们最后到了当时著名的“皇宫舞厅”，一进门，虽然爵士音乐和笑语萦绕，显得有些“升平”气象，但是四周墙壁上煤油灯散发出的浓烈的烟雾，却呛得人两眼辣辣，呼吸紧促，因而来的舞客不多，而坐在舞池周围等候顾客的舞女，却超过了舞客的人数。

在汉口的许多大街小巷，特别是在房屋建筑比较完好的地方，有一个突出的点缀：什么“××特派员办公处”、“×××职员住宅”和什么“办公重地，不准侵扰”、“听候接管，不准扰动”等等招贴或用信笺书写的字条贴在门上，有的则是门缝间贴上了或长或短的封条。在这些建筑物门口，有的站着一两个伪军把守，有的大门紧闭，并无警卫。虽然这些贴纸条的单位名称不同，但都有一个鲜红的“关防”，说明这栋房屋已归贴字条者所有了。当然人们只能看它一眼，谁也没有管它。

就在怡和村“前进指挥所”东边通向中山路到江边的一条马路上，每到夜间，通宵不停地车声隆隆。我曾几次在阳台眺望，通亮的车灯照射着，一辆又一辆车急驶而过。为此，我曾问“研究室”的人，他们说可能是日本军部赶运什么东西。很显然，这是日军抢在“国军”到达前销毁军火和重要物资。不然，为什么白天毫无动静，到了夜间却这样紧张？我同谢士炎谈到这个问题，他也认为无可奈何。这也和人们看到国民党“劫收者”贴的封条一样，对于日军这样继续横行，我们也只有“看他一眼”。

每到夜间，街头上是看不到日本人的。有天晚上，我因受周苍柏（在恩施任湖北省银行总经理）的委托，带着司机去到黄陂

路青年会隔壁那条巷子里，走进周苍柏住宅的大门，只见屋内一片黑暗，却有一阵吱吱哇哇的喧闹声。司机说："可能又是日本人在里面喝酒。"他拿着电筒赶紧走了进去，大吼一声："你们在搞么事?!"忽然5个日本兵各提一支步枪，慌慌张张地窜了出来，有的手里还拿着酒瓶，一溜烟地跑出去了。我到内室一看，根本没有一件家俱，地上尽是酒瓶、罐头盒、破报纸……，乱七八糟。很显然，这几个日本兵是在这里"借酒浇愁"，哀叹他们的末日。

9月18日武汉"受降典礼"

武汉"受降典礼"是在中国人民难忘的国耻纪念日9月18日。在此之前，国民党"受降"部队共3个军于9月10日至15日分三路进入武汉，统归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总受降官"王敬玖指挥。

接着，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忏、湖北省政府主席兼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东原和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邵华等党政军首脑人物，于9月17日到达武汉。随即宣布撤销"汉口前进指挥所"，正式发表郭忏为武汉警备总司令。

9月18日早晨，汉口中正路（即解放大道）从循礼门往硚口去的一段，以及由怡和村（即解放公园路）往中山公园去的马路两旁，布满了岗哨。中山公园内一片寂静，只是在公园西北角、靠广播电台的那块大草坪上，拥满了武汉地区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头面人物，还有几个美国军官夹在里面，东张西望，谈笑风生，都在准备迎接"受降典礼"。

"受降堂"设在"张公祠"内。这是一座平顶厅堂式的横列建筑屋，是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第十三子、沦陷时期的日伪武汉市市长张仁蠡特为表彰他的祖先而兴建的。祠内供有张之洞的牌位和他的家谱，供人凭吊。"国军"进城后，铲掉"张公祠"匾额，换上了"受降堂"三个金字。所以"受降"这天，这座厅堂便正

式命名。

约9时许，两辆军用摩托车引着一辆竖着白旗的黑色轿车驶进了公园，停在草坪进口处的武装警卫面前。只见一个蓄“东洋胡子”的矮个子走下车，他全身戎装，左手还握着一把长柄战刀，这就是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即“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他那副傲慢不驯的样子，的确使人气愤。这时，只见守卫在“受降堂”台阶前的第六战区长官部少将副官处长蒋虎志快步上前，从冈部手里夺下了战刀，带着他走向“受降堂”。

厅堂内已经摆好了受降的阵势：正中是一长列会议桌，孙蔚如临时戴上上将领章坐在当中（孙的军衔原为中将，而日军冈部直三郎是大将，似乎不称，所以为了应付这场典礼，经请示蒋介石批准，临时戴上将领章，走个过场），作为代表国民党的华中地区总受降官。孙的两侧，一是武汉区受降官王敬玖，一是湖北省主席王东原。其他则是军职师长以上，文职市长、厅长、省市党部主委以及地方耆宿、“民意”代表，还有美军人员等，共约50余人。

冈部走进厅堂，站在孙蔚如面前，脱帽敬礼。孙随即对他宣读了一道“命令”，冈部表示愿意遵照日本天皇旨意，无条件投降。于是孙命冈部在桌案上摆着的《投降书》上签字。接着命令他：下去后，按照指定地点和各项规定，集中部队和军火、物资，听候收缴、点验。并告诉他，可以继续住在他原来的司令部里，生活待遇不变。冈部听了频频点头，最后退出厅堂，仍由两辆军用摩托将他送走。

一场“受降典礼”就此结束。

宣布“全面接管”和肃奸

“受降”后不过三天，第六战区长官部在受降堂召开了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也就是抗战胜利后武汉地区的首次所谓“甲级会

报”。召集人是孙蔚如和郭忏，到会的有王敬玖、王东原、邵华、汉口市市长徐会之、武汉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彭善、参谋长吴光乾以及长官部处长以上、部队师长以上将领；谢士炎以原前进指挥所主任出席；我则是以武汉新闻文化方面负责人的身份参加。

会议开始，郭忏概述了第六战区范围内的部队位置和受降、收编情况。随即由谢士炎汇报前进指挥所的那一段工作。王敬玖简略地报告了他指挥的部队开进武汉和在各地受降的经过。会中还发生了王敬玖指责谢士炎“目无长官、独断独行……”，中途退席而去的插曲。

会议最后由郭忏宣布了两项决定：一是全面接管，9月1日在恩施成立的第六战区敌伪物资接管委员会，即日起在武汉正式开展工作。二是加紧肃奸，武汉及第六战区范围内的重要汉奸，一定要在“双十节”（10月10日）前捕获归案。

会后，第六战区范围内的分区受降工作，于9月25日结束，共解除了5.3万多名日军武装。10月1日正式公布逮捕武汉地区汉奸200多人的名单。

这份首批逮捕的“肃奸”名单，绝大多数是“密侦”“翻译”之流、这些直接为虎作伥的汉奸特务，当然应该法办；可是武汉的大汉奸，只有伪湖北省省长叶蓬和伪武汉市市长石星川两个人，还有大量的罪大恶极的党政军特汉奸人物，却逍遥法外。

（萧志华根据徐怨宇遗稿整理）

第六战区受降

和

接管敌伪物质内幕

萧润生

内容提要：劫夺胜利果实的前驱工作；俘虏的管训和遣送经过；日寇妄想卷土重来的阴谋活动；是怎样对待汉奸的；接收开始时就作了打内战的准备；造成接收混乱的前因后果；集体贪污真象；继续霸占民房；争夺交通设施；盗卖工厂企业的手法；接管物资大量被糟蹋；处理接管物资中的舞弊行为；沽名钓誉，欺骗人民；谢士炎之死。

劫夺胜利果实的前驱工作

1945年8月15日，我国军民经过8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迫使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胜利后，关于华中地区的受降和敌伪物资的接管，属第六战区的范围。在司令长官孙蔚如和副长官郭忏的主持下，于1945年9月18日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了受降仪式。

第六战区为了贯彻蒋介石劫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的目的，当即组建了以参谋处少将处长谢士炎为首的前进指挥所，8月31日率部直飞汉口。谢的首要任务，是在部署复员接收的幌子下，与日本侵华第六方面军寇酋冈部直三郎合谋阻止一直活动在抗战前线、进出武汉外围的人民武装，不许他们进入武汉及所有敌伪占

领地区，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旨意："所有解放区抗日军队，原地驻防待命；日伪军负责维持治安，等待国军（指国民党的军队）接收。"具体地说也就是："凭借日寇，利用伪军；限制'奸匪'，准备内战。"

当时，命汉奸军长邹平凡所部卫戍武汉，其余敌伪军队各就原地严密监视共产党的活动，确保交通要点；所有武器、装备物资，没有长官部的命令，不得交与任何部队和私人接收。

这期间，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及其所部第九十二军和六十六军，亦已先后到达武汉。此外各种各样国民党敌后工作的机构和个人，都纷纷从地下冒了出来；夹杂着尚未进入集中营的日俘和没有收编的伪军人员，满街乱窜，形成一片混乱、敌我不分的尴尬局面。

长官部于9月15日由湖北恩施经巴东，乘民本轮直达汉口。所有受降接收事宜，都是根据何应钦陆军总部的指示。接受对象是日寇侵华派遣军第六方面军所属及其所辖湘鄂赣等省市。双方备忘录规定：日方司令官一级对我方参谋长一级；他的参谋长只能对我参谋处低一级行文。刚一开始，他们都能遵意承办，移交册一式五份，文件照例正副两份；有关厂矿企业以及比较繁复的交接，还附以示意要图；有些生产的单位，在移交前仍然维持局部生产，停产的也作了复工准备。可是这些设施一经我方接收过手，就像被大水冲洗一样，一律遭到洗劫和破坏。在参谋业务方面，我方处处被动，如我参谋二科搞了10多天才出笼的遣俘计划，不合实际需要；而日方只一夜功夫另拟的一份却被采用了。两天后，将计划铅印附图表，装订成册，给我们送来500本。据说他们参谋处只有8个参谋。

两方工作联系，在战区一级，主要是日方第六方面军司令部的参谋和我方长官部的业务主管参谋进行直接联系。包括所有日俘的集中、管训和遣送，敌伪物资产业的交接等具体策划工作。当

时我是参谋三科交通运输兼工兵器材业务主办参谋。从接受开始至处理终结，一竿子到底我都参与其事。其后，结束清理工作，也是由我主办的。

日方参谋一来就是四五个人一道，各就有关业务和问题接谈联系。他们每次都是乘用我方允许留用的小汽车，身着呢制服，佩着参谋带，比我们穿着初到武汉时临时赶制的一套平布单军服显得神气。但我们并不感到寒伧，大家气势昂扬地与他们见面。

第一次他们打算行握手礼，我们没有伸出自己的手，他们愣了一会，带着羞愧和愤恨的神态，慢慢缩了回去。从此，在我们的严厉训导之下，他们逐步老实就范了。再来时，以战败者的身份，规规矩矩地呆在接待室，等待值勤副官把接待他们的参谋引进，他们一致起立敬礼，叫坐才局促地坐下。我们的值勤副官佩着黄颜色的勤务带，严肃地呆在室外。据说这是国际惯例。我方与日方接触的人员，特别注重仪表，事前都经过挑选和必要训示的。

在开始二三个月的接触中，各用本国语言，通过自己带的译员交谈。以后日益熟识了，那种敌对情绪在不知不觉中消逝。直接谈话既方便，又省事，礼节逐渐马虎了，值勤副官们也不一定象先前那样作了。因为那伙日方参谋人员在侵华期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是武汉方言。尽管这样，两方的译员还是要带着摆样子，他们的译员由他们的参谋人员轮流扮用，我方则是日文秘书担任。

接收华中区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长官部，它领导临时组成的"第六战区敌伪物资产业接收管理委员会"，负责指挥兵站、中央驻汉机构和省市地方军政单位执行有关接收具体工作。

长官部的实际负责人是副长官兼参谋长郭忏，长官孙蔚如备位而已。原来孙调整往第六战区之前，是第一战区副长官兼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这个集团军是杨虎城将军的老底子，孙是杨的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